

城乡要素共生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基于依存条件和影响效应的多案例研究

黄曼, 庄晋财, 孙泽南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 乡村产业融合是中国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在城乡要素市场分割的背景下, 城乡要素共生与乡村产业融合之间需要协同匹配。通过多案例研究, 深入分析城乡要素共生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对乡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 从各模式的共性看, 城乡要素共生以要素质参量兼容、共生频率深化、共生界面稳定为前提, 最终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从依存条件的差异性看, 要素属性、交易维度和主体特质的差异影响共生界面的生成, 形成契约性共生、一体化共生、平台型共生三种类型; 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看, 共生关系的产业跨度、关系形态和关系结构影响乡村产业融合的模式, 形成纵向延伸融合、横向交叉融合、产业链网融合三种模式。

关键词: 城乡要素共生; 乡村产业融合; 依存条件; 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99.2;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4)06-0101-10

Urban-rural factor symbiosis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 multi-case analysis based on dependent conditions and influence effects

HUANG Man, ZHUANG Jincai, SUN Zena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urban-rural factor symbiosis and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need to be coordinated and match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multi-case comparis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elements symbiosis and its impact o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rom the commonness of each model, the premise of urban-rural element symbiosis is to be compatible with quality parameters, deepen symbiosis frequency and stabilize symbiosis interfac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 of dependency conditions, the differences of factor attributes, transaction dimensions and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symbiosis interface, forming three types: contractual symbiosis, integrated symbiosis and platform symbio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s in impact effects, the industrial span, relationship form and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ffect the mode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forming three modes: vertical extension integration, horizontal cross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 network integration.

Key words: rural-urban elemental symbiosi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pendency condition; influence effect

收稿日期: 2024-02-19 修回日期: 2024-04-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要素共生视角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19BGL14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运行机制与政策支持研究”(23&ZD112)。

作者简介: 黄曼(1994—), 女, 江苏无锡人,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创业与区域产业发展。通信作者: 庄晋财。

乡村产业融合是中国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农村产业兴旺和农民福祉提升的重要路径^[1]。早在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在破解‘三农’难题上取得新突破就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融合是指优化配置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通过农业产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有效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范围、助推产业功能转型的过程^[2-3]。生产要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4],在中国的二元社会中,城市要素的乡村流入和共生是乡村产业融合的基础。一方面,城乡要素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资本、信息等城市高级要素很难自由流向农村^[5];另一方面,主体的利益目标冲突影响要素在乡村的和谐共生,从而动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下乡资本“毁约弃耕”“跑路烂尾”现象便是例证^[6]。因此,立足中国二元体制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境下,探讨城乡要素的协同共生关系及其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如何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赵霞等^[7]从融合动力的视角,认为乡村三产融合的驱动因素包括技术创新、主体利益、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苏毅清等^[8]从融合模式的视角,认为乡村产业融合包括农业内部融合、产业链纵向延伸、横向交叉融合、科技渗透等不同模式;还有学者从组织形式的视角,提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联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乡村产业融合的有效组织载体^[9-10]。随着研究的细化,学者们开始聚焦微观产业要素对乡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如王定祥等^[11]认为数字技术发展对乡村产业融合有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越高,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越高^[12]。还有学者剖析城乡要素主体的角色定位以及彼此的互动关系^[13],如王长征等^[14]认为农民合作社是城乡要素主体互动的载体,“专业合作社联合—新型市场主体关系—产业聚合体”是乡村产业融合的有效路径。

可以看出,关于如何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主要涉及宏观层面的产业互动以及中观层面的产业融合类型、动因等内容,并且关注到微观层面要素主体的共生行为。但是,现有研究对存在“怎样的城乡要素类型,以怎样的共生模式,形成怎样的共生关系,在什么样的产业基础上,通过怎样的融合模式,对乡村产业融合产生何种影响”等诸多问题关注不足,忽视了城乡要素共生与乡村产业融合之间的协同匹配关系。为了探究以上问题,本文基于共生理论、六次产业理论、企业边界理论等,通过多案例比较,深入分析城乡要素共生的依存条件及其对乡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从而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协同匹配关系,为各地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一)城乡要素共生的内涵界定

共生在经济学领域是指不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传导物质、信息和能量,并且基于某种利害关系结成的竞合关系^[15]。资源(要素)是不同经济系统共生关系建立的主要纽带,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在二元体制的惯性影响下,产业要素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分布在城市,土地、劳动力、生态资源等要素分布在农村^[16]。如果完全依靠农村自身的要素积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很难走出单一产业结构困境。因此,城乡要素共生强调的是城市高级要素入乡,与乡村要素协同互补、融合发展。

根据共生理论,质参量描述了共生单元的内在特性,质参量兼容反映了城乡要素互补的状态。当质参量兼容时,共生单元才会按照一定的方式形成共生关系。如果用 $Z_U(Z_{U1}, Z_{U2}, Z_{U3}, \dots, Z_{Un})$ 和 $Z_R(Z_{R1}, Z_{R2}, Z_{R3}, \dots, Z_{Rn})$ 分别反映城市和乡村要素主体的质参量。那么,城乡要素共生的条件可以表示为:至少有一个 $Z_{Ui} = f(Z_{Ri})$ 或者 $Z_{Ri} = f(Z_{Ui})$ 。也就是说,城乡要素主体之间,基于双方的供需关系,必然存在着以资金、信息等为媒介的某种联系。如农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农户提供农业中间品,以此形成具有某种稳定性的共生关

系。另一方面,共生界面维系着城乡要素主体的共生关系,点共生、间歇共生和连续共生是反映关系强度的3种组织形态,影响共生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点共生是基于短期利益交换而形成的一次性交易,在市场风险的冲击下,偶发的价值分配引致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15]。从系统进化的角度看,要素共生由点共生向间歇共生或连续共生演化,需要在共生界面上构建起完善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市场机制治理、契约治理、科层制治理、关系治理等治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共生界面中的治理机制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主次协同的组合状态。

鉴于此,城乡要素共生是指技术、企业家才能等城市高级要素入乡,与土地、劳动力、生态资源等要素协同互补、融合发展,在市场机制治理、契约治理、科层制治理、关系治理等多重治理机制组合的共生界面上,形成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共生关系。

(二)分析框架

(1)六次产业理论。根据六次产业理论,整合农业产业链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17],主要包括两种模式。一是纵向延伸融合模式。技术等先进要素的渗透加强了农业生产的可分性,农业分工形成包括品种研发、生产资料供给、田间管理、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等产业部门,分工深化使得生产链条的节点不断清晰,最终形成农业产销全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模式。二是横向交叉融合模式。引入旅游、文化等产业的经营理念或资源要素,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或商业模式^[18],开发农业的文化、生态、康养等多重功能,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形成横向交叉融合模式^[19]。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或横向拓展的差异性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融合模式。但是,根据产业链演化从点到线,由线到面,再由面到网的规律,当不同节点的要素主体数量增加并形成有序竞争后,原有的产业链节点形成独立的价值模块,具有“即插即用”的特性。不同的价值模块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由此形成纵横交错的产业链网融合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乡村产业融合解构成纵向延伸融合、横向交叉融合和产业链网融合3种模式。

(2)企业边界理论。传统的企业边界理论指出,企业 and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威廉姆森认为中间性体制组织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受到契约约束^[20]。传统企业边界理论假设企业面对的是单一市场。但是,数字经济的兴起使企业边界转变为一种可穿透结构,平台企业可以链接双边甚至多边市场,通过提供一系列服务撮合多边市场,解决各方集聚产生的交易成本问题^[21]。从企业边界理论的发展来看,存在市场、契约、企业和平台4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结合前述关于共生关系治理机制的讨论,城乡要素共生界面存在契约性共生、一体化共生和平台型共生3种类型。具体而言,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共生界面存在偶然性,无法满足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一体化共生界面以科层制治理为主导,根据产权、职务等级等权威将所有要素纳入组织内部,本质是企业组织;契约性共生通过书面合约约束共生关系,是偏向市场的共生形式;平台型共生通过设计规则驱动要素主体在组织边界内以自组织方式进行互动,具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属性,关系治理和网络化治理规范并维系多元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

(3)分析框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形式的创新,首要原因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寻求要素增值^[22]。交易维度,即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组合函数,决定了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最能降低交易成本。在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除了交易维度,要素属性和个体特性同样会影响共生界面的选择^[23]。这是因为,在城乡要素分布不均衡的条件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突破生产经营所需技术、信息等稀缺要素的约束。掌握稀缺要素的主体就会占据主导地位^[24],一方面,主导者的经济实力不同,面临要素的约束程度也会不同;另一方面,即使面临相同的客观条件,交易者也会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共生界面。因此,本文

从要素属性、主体特性和交易维度 3 方面识别共生界面的依存条件。

乡村产业融合是城乡要素在微观产业组织(共生界面)内部形成共生关系的过程。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界面中析出的共生关系在产业跨度、关系结构、关系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性^[25]。结合乡村产业融合模式来看,城乡要素主体间的共生关系既可以沿着农业产业链进行,也可以跨农业产业融合而成,这由共生组织的经营范围和市场空间决定。另外,共生关系的结构既存在“线链接”,也存在“网交织”的形态。要素主体之间竞争的有序性为某个生产节点断裂为独立价值模块提供可能,成为“线链接”向“网交织”进化的标志^[26]。城乡要素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只有在竞争和合作的

对立统一下,才能演进与深化,竞争与合作因此成为影响共生关系结构的两种形态。要素互补性决定了主体间的合作形态,要素替代性决定了主体间的竞争形态。可见,共生关系在产业跨度、关系形态和关系结构 3 方面均存在差异,进而能与不同的产业融合模式进行匹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依存条件—共生界面—共生关系—产业融合”的分析框架(见图 1)。城乡要素共生界面存在契约性共生、一体化共生和平台型共生 3 种类型,共生界面的选择受到要素属性、主体特性和交易维度的影响,这是共生界面形成的依存条件;共生界面上析出产业跨度、形态、结构均不相同的共生关系,影响乡村产业融合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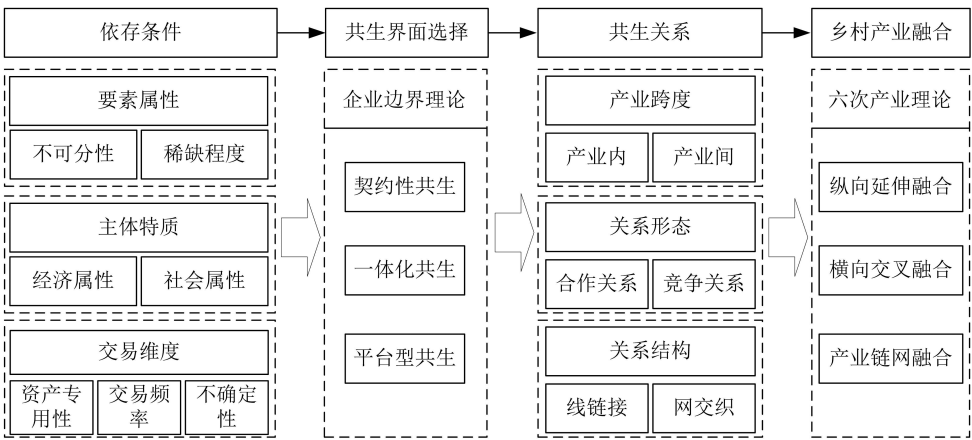


图 1 城乡要素共生影响乡村产业融合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描述

(一)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适用于涉及“how”和“what”的研究范畴^[27],多案例分析可以直观反映城乡要素共生的实然状态。本文选取 3 个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见表 1),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剖析依存条件、共生界面、共生关系和乡村产业融合之间复杂的匹配关系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理论联系^[28]。数据采集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观察。2019 年 8 月、2021 年 2 月和 2022 年 7 月,课题组在巢湖市、镇江市和无锡市开展追踪式田野调研,重点对农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农户、村镇干部等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观察资本下乡参

与产业融合取得的效果。2023 年 3 月进行线上回访,最终形成近 10 万字的访谈资料。二是采集二手资料。从 CNKI 数据库、媒体报道中收集相关资料,遵循三角测量法,与一手数据进行对比与验证。

选择案例样本的原因包括:①案例数据可靠性和代表性较高,所选案例分别呈现一体化共生、契约性共生、平台型共生 3 种类型,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致富等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且被当地政府、媒体作为示范宣传;②共生环境的干预性较弱。经过长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积累,镇江市、无锡市和巢湖市拥有丰富的城市资本,且鼓励工商资本投入乡村振兴,三家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一致性较高。

表1 典型案例产业融合的调研情况

案例	共生类型	共生主体	要素质量兼容	共生界面	治理机制	产业融合
康韵菌菇	契约性共生	JNSW 公司、食用菌户	企业提供种质资源、种植技术,与农民的劳动力结合,生产菌菇产品;农民提供菌菇产品,企业负责精深加工、销售	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契约组织	契约治理	纵向延伸融合
芳阳农业	一体化共生	FX 镇属企业、8 个农村集体组织	村集体流转土地,与劳动力、技术结合,生产优质大米产品;资金与土地兼容,成立育秧中心,打造电商销售平台;生态资源、土地、文化与资金共生,打造农业文旅产业园	入股成立无锡市芳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科层制治理	纵向延伸融合、横向交叉融合
SGGS	平台型共生	安徽 H 集团、专业合作社、返乡创业青年、电商企业、本地村民	土地、文化、资金兼容,建设郁金香高地、打造民俗文化休闲旅游项目;知识、资金、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产品互补,打造统一的平台	安徽 H 集团打造的 SGGS 平台	网络化治理、关系治理	高度融合的产业链网

(二) 案例描述

(1) 契约性共生: 康韵菌菇案例。2002 年, JNSW 公司^①通过丹阳市食用菌协会, 与皇塘镇的食用菌种植户签订“五统一、二保证”的合约, 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契约性组织。一方面, 合同对收购菌菇的大小形状、菌盖的厚度以及残缺菇的比例提出了明确的标准, 以此控制农业中间品的成本和质量; 另一方面, 合同规定了菌菇的保底价格, 在当月平均市场价格与保底价格中取高进行回收。“价格贴水”的收购方式保证以最低保护价收购订单, 提高了农户履约效率。总的来看, 菇农负责菌菇种植, JNSW 公司负责品种研发、菌种选育、菌菇加工、产品销售等核心业务, 并以正式合同维系共生关系的稳定, 最终形成纵向延伸融合模式(见图2)。

(2) 一体化共生: 芳阳农业案例。2019 年, FX 公司主导的芳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由 8 个村共同入股, 组成“公司+村集体组织+农户”的

一体化组织。一方面, 芳阳农业采用重资产经营策略打造“阳山荡大米”品牌, 获取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 另一方面, 芳阳农业打造农业观光景点、改造村民房屋, 充分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总的来看, 芳阳农业综合权衡当地的产业基础等条件, 从农业产业链中筛选稻米种植环节, 从旅游产业链中筛选出“吃”“住”“游”环节, 将筛选出的多个环节重新匹配成新型的产业链条, 形成横向交叉融合模式。此外, 芳阳农业同样打造稻米的全产业链条, 形成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融合模式(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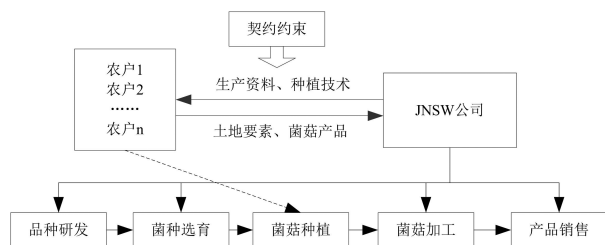


图2 康韵菌菇的产业融合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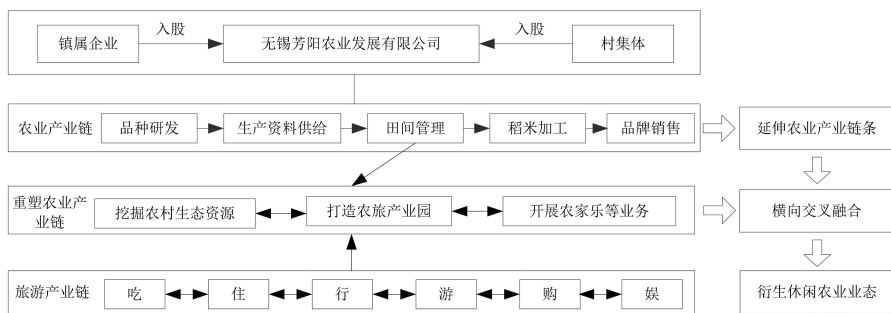


图3 芳阳农业的产业融合模式

① 在调研中,课题组充分考虑受访者的意愿,针对不愿意公开企业名称和个人姓名的情况,本文统一采用首字母缩写的方式呈现。

(3)平台型共生:SGGS 案例。2015 年,安徽 H 集团主导成立 SGGS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打造乡村产业融合项目。过程中,要素资源丰富且来源众多,不仅包括企业自身具有的知识、技术和资金资源,还包括周边村庄的特色农业产品、返乡青年的创业才能、电商企业的市场资源、本地村民的劳动力资源等。H 集团的重点工作是打造平台,提供统一的联

系界面和规则将这些要素主体联系起来;其他要素主体根据规则链接到平台的各个功能模块上,整体呈现出一种“中心辐射式”结构^[29]。总的来看,SGGS 提供统一的联系平台,多元要素主体链接至此平台,形成了特色农产品模块、创业模块、电商模块、旅游模块 4 个功能模块,模块之间两两交叉重组,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链网融合模式(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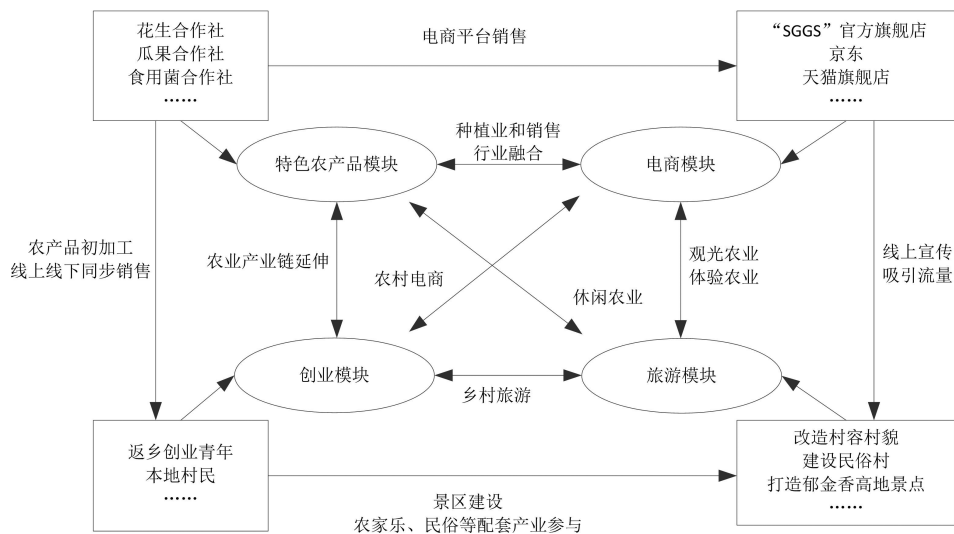


图 4 SGGS 的产业融合模式

三、多案例比较分析

(一)共性:城乡要素共生和乡村产业融合的协同关系

乡村产业融合强调农业产品的标准化、优质性和独特功能开发,不仅需要劳动力、土地的投入,还要根据融合模式的差异引入技术、管理等高级要素^[16]。现实中,任何个体很难拥有全部需要的生产要素,农民的元素积累更是匮乏。相较之,城乡要素共生能够满足要素多元化的需求,并能应对产业融合过程中要素需求不断变化的状况,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城乡要素质参量兼容。根据特征属性不同,每一大类生产要素可以细分为诸多专业性要素。以技术为例,既包括新品种培育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品技术,也包括物流技术、物联网技术的辅助技术。案例中,康韵菌菇注重产品技术开发,芳阳农业注重物联网技术使用,SGGS 则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即使技术要素的特征属性不同,

但它们都能与农业产品质参量相容,形成产业融合中不同的产业节点。可见,乡村产业融合不是要素的简单机械组合,而是质参量兼容的要素不断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的过程。对整个产业系统而言,要素质参量兼容性越强,产业节点越多,乡村产业融合的业态就越丰富。

二是城乡要素共生频率加深。3 个案例的共生模式均为间歇共生或连续共生,JNSW 公司与菌农在技术培训和中间品提供环节进行数次合作,属于间歇共生;芳阳农业和 SGGS 将要素主体间的互动行为纳入到企业或平台内部,共生频率加深为连续共生。可见,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实现点共生向间歇共生和连续共生演化,加深要素共生的频率。

三是城乡要素共生界面稳定。多重治理机制构成的共生界面影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康韵菌菇以契约治理协调公司与农户的利益关系,通过增加事前的交易费用来避免事后的风险损失,以

此维持共生关系的稳定;芳阳农业以科层制治理掌握要素的所有权,减少高资产专用性投资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共生关系的稳定性增强;SGGS以信任、互惠等关系治理机制降低了交易频率提升带来的交易成本,保证共生界面的稳定。总的来说,稳定持久的共生关系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依存条件:共生界面选择的比较

(1)要素属性。要素属性主要指要素的稀缺程度、不可分性等。要素的稀缺程度越高,倾向于企业属性的共生界面更容易被选择。如乡村产业融合不仅需要耕地资源,还依赖设施农业用地、建设用地的投入。多种类型土地的需求导致农村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增强。芳阳农业的管理人员 DWY 说到:“为了获得规模化耕地和数片建设用地的使用权,8 个村庄以土地入股形式与 FX 企业成立一体化共生组织。”此外,青山绿水和乡风民俗等资源同样具有稀缺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生态资源的不可分性,如果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排他性占有和开发,同样倾向企业属性的共生组织。温铁军等^[30]的研究发现,通过股权、债权等形式,可以对不可分资源进行多样性开发和组合型投资。多案例比较发现,涉及生态资源开发的环节均使用一体化形式,例如,芳阳农业打造农旅产业园;SGGS 进行景区建设、打造郁金香景点。与之相反,如果要素的稀缺性或不可分割性较弱,共生界面的市场化程度会增强。如契约性共生适用于农业中间品的交易。

(2)交易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交易属性不同导致治理结构具有差异性。案例中,芳阳农业采用的是重资产经营策略,为了避免高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一体化组织更具有适用性。相较之,康韵菌菇采用的是轻资产经营策略,注重技术创新、应用和传递。并且,企业与菌农的交易频率较低,仅在种植环节有所联系,因此康韵菌菇倾向于结成契约性共生组织。SGGS 案例涉及的利益相关群体数量更多,交

易类型更复杂,商家、客户和平台组成了一个多边市场,单纯的契约治理或企业治理都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技术进步催生了兼具市场和企业双重属性的平台组织,平台为要素主体设定统一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简化了要素供需双方的匹配过程,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提升交易效率^[31]。因此,SGGS 选择平台型共生组织,通过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活动,以此降低要素集聚、交易频率深化和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组织成本。

(3)主体特质。共生主体的经济社会特质导致共生界面的差异。从经济特性来看,共生主体选择合适的共生界面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要素增值。因此,要素属性和交易维度成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若经营主体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则其受到要素制约和交易约束程度较低,由他们主导的共生关系更倾向于市场属性。正如 JNSW 公司负责人 GYJ 所言:“JNSW 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掌握先进的品种培育和深加工技术,面临的约束条件仅仅是农户提供菌菇产品的质量。”因此,JNSW 公司用契约形式制定产品收购标准,就能保证共生关系的持久性。从社会特征来看,经营主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地方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都会左右共生界面的具体形式。在芳阳农业中,FX 公司属于镇属企业,承担着乡村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因此,选择了与农民、村集体组织利益联结紧密的一体化组织。SGGS 案例中,H 集团虽然是民营企业,但是由于产业融合项目是整村推进的,涉及到的道路整修、村民安置等工作都是由地方政府安排,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影响企业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形成的也是紧密度高的一体化共生模式。

综上所述,要素属性、交易维度和主体特质的差异影响共生界面的生成,形成契约性共生、一体化共生、平台型共生 3 种类型(见表 2)。如果不能选择合适的共生组织,乡村产业融合会由于共生界面丧失稳定性而走向失败。

表 2 案例共生界面选择的依存条件

案例	要素属性	交易维度	主体特质	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属性
康韵菌菇	农业中间品稀缺性、不可分割性较弱	轻资产经营； 交易频率较低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经济实力强	契约性共生	偏向市场属性
芳阳农业	建设土地稀缺性强； 生态资源不可分割性强	重资产投资； 交易频率高	镇属企业经济实力强， 且具有亲社会性	一体化共生	具有企业属性
SGGS	建设土地稀缺性强； 生态资源不可分割性强； 农产品稀缺性、不可分割性较弱	混合型资产投资；交 易频率最高	民营企业经济实力强， 政府干预增强组织亲 社会性	平台型共生	兼具市场和企业属性

(二)影响效应:共生关系形成的比较

(1)产业跨度:产业内或产业间。农业和多产业的排列组合具有多种形式,导致产业融合的业态丰度具有差异性。从融合结果来看,三种共生界面的产业跨度并不相同,可以分为产业内和产业间两种形式。在纵向延伸融合模式中,城乡要素主体沿着农业产业内价值链纵向延伸的方向形成共生关系,是产业内的共生关系。在康韵菌菇和芳阳农业的案例中,实力较强的农业生产经营者,JNSW 公司和 FX 公司,控制微笑曲线的两端,农户负责中间的种植环节,实现的是产业内的共生关系。在横向交叉融合模式中,技术进步和制度放松使得农业产业链能够和其他相关产业进行要素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农业主体通过与其他产业主体分工协作进入“蓝海”领域,形成跨产业的共生关系。FX 公司与特色田园乡村合作开发乡村旅游业务,形成产业间的共生关系;在 SGGS 的案例中,平台型界面中的共生关系产业跨度最大,形成包括互联网+农业、旅游+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多种业态。

(2)关系形态:合作或竞合关系。共生关系本质是一种竞合关系,各个共生界面的主体处于不同程度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之中。在康韵菌菇中,JNSW 公司以正式合同形式向农户收购农产品,并通过数字化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二者之间形成互补合作的共生关系,并能维持彼此的独立性。与之相比,芳阳农业以股权分配方式将交易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要素主体丧失独立性。在科层制治理机制下,不同环节的要素主体间的分工合作程度相应加强。可以看出,即使合作程度有所不同,但康韵菌菇和芳阳农业的共性在于共生单元之间是合作关系,且具有明显的组织边界。在 SGGS 的案例中,H 集团提供统一的平台后,各要素主体不再以某种固定的契约方式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而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组织

能力自由地链接至平台的功能模块上。由于缔约方式的自由性和组织边界的可渗透性,产业融合中的节点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单个环节内部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环节之间依旧是互补合作关系。这种竞合关系将纯粹的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升级为超市场契约^[32],共生单元之间分工方式由互补分工演化为具有竞争性质的模块化分工。

(3)关系结构:线链接或网交织。关系结构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系形态的影响。在康韵菌菇和芳阳农业的案例中,城乡要素主体基于投入产出联系或是功能业务关联形成的共生关系都表现出“线”链接形态,进而促进纵向延伸融合或横向交叉融合发展。与上述线性合作的共生关系不同,在 SGGS 的案例中,城乡要素主体形成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网络状共生关系。在平台型界面中,任何符合标准的企业都能自由接入到某一个具体的业务节点中,随着某一节点中的企业数量不断集聚,该节点在竞争机制作用下最终形成独立的价值模块,呈现出兼容性和可重复性。这种特性决定了价值链上各环节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结方式——价值模块之间的自由嵌入与组合,使共生由顺序式的线性关系转化为立体的网状关系,形成产业链网形态。

综上所述,不同的共生界面析出产业跨度、关系形态和关系结构都不相同的共生关系,产业跨度(产业内或产业间)、关系形态(合作或竞合关系)和关系结构(线链接或网交织)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促成三种不同的产业融合模式(见表 3)。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透过 3 个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各模式的共性来看,城乡要素共生以要素质参量兼容、共生频率深化、共生界面稳定为前提,最终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二,从依存条件的差异性来看,要素属性、交易维度

表3 案例乡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

案例	共生界面	产业跨度	关系形态	关系结构	产业融合模式
康韵菌菇	契约性共生	沿着农业产业链条方向	合作	线链接	纵向延伸融合
芳阳农业	一体化共生	跨越农业产业链条方向	合作	线链接	横向交叉融合
SGGS	平台型共生	延长并跨越农业产业链条	合作,且形成有序的竞争	网交织	产业链网融合

和主体特质交互影响共生界面的选择。主体特质会改变要素属性和交易维度的作用强度,共生不仅为了追求要素增值,更为了实现农民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目标。第三,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来看,不同的共生界面析出产业跨度、关系形态和关系结构都不相同的共生关系,产业跨

度(产业内或产业间)、关系形态(合作或竞合关系)和关系结构(线链接或网交织)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促成3种不同的产业融合模式。以上结论回答了城乡要素共生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协同匹配关系,主要的逻辑展示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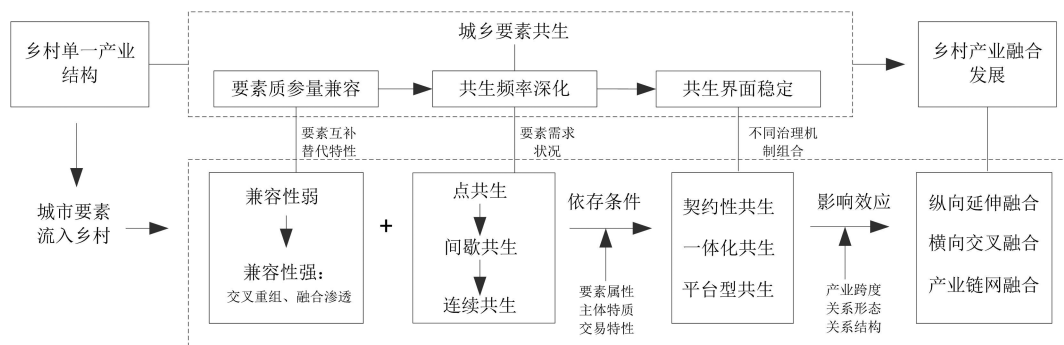


图5 城乡要素共生影响乡村产业融合的逻辑

(二)政策启示

第一,聚焦共生关系的稳定性,夯实乡村产业融合基础。一是培育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技术、管理等特色农业职业培训,培养跨领域、会经营、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合作经济等方式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乡村要素主体的谈判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缓解资本下乡极有可能带来小农挤出效应等问题。二是完善多元治理协同的利益联结机制。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等利益联结模式,探索契约性共生、一体化共生和平台型共生等共生组织形式,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生体。在共生组织形成或演进的过程中,完善市场治理、契约治理、科层制治理、关系治理等机制,在不同共生组织中采用不同的主导性治理机制安排以及不同治理机制的合理组合,稳定城乡要素共生关系。

第二,关注共生界面的适配性,稳定乡村产业融合成效。一是遵循依存条件选择合适的共生界面。针对要素稀缺程度高、不可分性强的情况,或高度资产专用性投资、交易频率较高的情况,可以采用以股份制、合作制、公司制等现代企业形式主

导的一体化共生组织;反之,选择以较为完备的契约约束共生主体的行为,降低双方毁约的风险;针对涉及三方或多方交易主体、交易频率不断深化的复杂情况,可以采用平台型共生整合农业资源,以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培养和激发城市资本的亲社会行为。城市资本的亲社会性越强,越倾向于采取维护农户权益的共生模式。因此,可以通过强化党政系统信息报送、官方媒体宣传等方式,加强对城市资本参与乡村产业融合、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等行动的肯定、奖励和宣传,培养和激发城市资本的亲社会行为,从而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生体。

第三,加强共生模式的多元性,深化乡村产业融合程度。一是鼓励城市资本进入适宜的农业领域,坚持技术、文化赋能与地方产业特色相结合的原则,以税收扶持、财政投入以及贷款优惠等多种方式,鼓励城市资本进入深度融合领域,如农业服务业、农产品深加工等,形成产业跨度、关系形态不尽相同的“线链接”共生关系,持续加深纵向延伸和横向交叉融合水平。二是推动乡村平台组织的创新发展。产业平台以科技为依托,实现乡村不同产业、不同业态

之间生产要素的网络状链接,是城乡要素共生的高级形态。因此,要提升平台经济赋能乡村产业融合的效能,具体而言:夯实产业平台的基础建设,既包括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的建立,也包括电力、物流等传统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树立标准化思维,制定平台规则,以“互联网+三农”、“特色小镇+三农”等多种形式创建农业价值模块的整合平台,不断深化乡村产业融合程度。

参考文献:

- [1]牛文涛,郑景露,唐轲.农村三产融合赋能农民就业增收再审视:基于河南省孟庄镇、龙湖镇、薛店镇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2(8):132-144.
- [2]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着力点[J].中州学刊,2016(5):43-49.
- [3]马晓河.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J].中国合作经济,2015(2):43-44.
- [4]江泽林.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再探索[J].农业经济问题,2021(6):8-18.
- [5]胡海,庄天慧.共生理论视域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共生机制、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20(8):68-76.
- [6]周振.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跑路烂尾”之谜:基于要素配置的研究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20(2):34-46.
- [7]赵霞,韩一军,姜楠.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4):49-57,111.
- [8]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6(8):17-28.
- [9]黄曼,庄晋财.合作联社、产业跃迁与乡村共同富裕:江苏省丁庄村的案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47-57.
- [10]王志刚,于滨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概念内涵、组织边界与增效机制:安徽案例举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9(2):60-80.
- [11]王定祥,冉希美.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2):1-14.
- [12]张林,温涛.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22(7):59-80.
- [13]傅琳琳,黄祖辉,朋文欢.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与推进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69-77.
- [14]王长征,冉曦,冉光和.农民合作社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研究:基于生产传统与现代市场的共生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2(10):60-71.
- [15]胡晓鹏.产业共生:理论界定及其内在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08(9):118-128.
- [16]宁志中,张琦.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J].地理研究,2020,39(10):2201-2213.
- [17]张来武.以六次产业理论引领创新创业[J].中国软科学,2016(1):1-5.
- [18]冯贺霞,王小林.基于六次产业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微观数据和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0(9):64-76.
- [19]李莉,景普秋.农村网络式产业融合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城乡互动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9(8):129-138.
- [20]康荣平,柯银斌.多元化经营的战略途径[J].企业改革与管理,1999(4):24-25.
- [21]ROCHET J C, TIROLE J.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3): 645-667.
- [22]孙天琦,魏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市场、准企业(准市场)和企业”的比较研究: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0(2):49-54.
- [23]马太超.“产业兴旺”的合约基础[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6):23-33.
- [24]肖婧文,冯梦黎.农村产业融合嬗变:利益联结与生产要素的互动和共演[J].财经科学,2020(9):64-78.
- [25]聂辉华.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J].经济科学,2002(3):112-120.
- [26]程李梅,庄晋财,李楚,等.产业链空间演化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陷阱”突破[J].中国工业经济,2013(8):135-147.
- [27]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 [28]GRAEBNER E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25-32.
- [29]史丹,李少林.双边市场视域下的平台经济:运行机制与治理逻辑[J].东南学术,2023(1):170-181.
- [30]温铁军,罗士轩,董筱丹,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8(12):1-7.
- [31]胡国栋,王晓杰.平台型企业的演化逻辑及自组织机制:基于海尔集团的案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3):143-152.
- [32]罗珉,何长见.组织间关系:界面规则与治理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87-95.

(本文责编:润泽)